

《南邦黎献集》与鄂尔泰对江南文教格局的构建^{*}

侯 冬

内容提要 《南邦黎献集》是鄂尔泰在江苏布政使任上所编的选本，所录作品多为其课士之作。鄂尔泰通过对这一选本的编纂，将官方意识形态渗透到文教秩序的构建与社会风气的塑造之中。他通过编选《南邦黎献集》，进行厘正文体与整饬士风的具体实践，树立官方对“江南”的教化权威；又对儒家礼仪的规范和“教育场域”加以改造，进而利用塑造“盛世”“圣君”的手段，贯彻清初帝王融合“治统”与“道统”的意图。通过对《南邦黎献集》编选过程的立体透视，可见官方意志对基层文教格局的构建和塑造。

关键词 鄂尔泰 《南邦黎献集》 江南 文教秩序 大一统

鄂尔泰为清前中期名臣，其受知于雍正，身后被乾隆赞为“国家之柱石，文武之仪型”^①。雍正元年（1723），鄂尔泰超擢为江苏布政使，到任后崇文重教、奖励名节，以复兴古学为己任，注重为国育才，较好地贯彻了雍正的施政理念，所谓“凡有裨于国计民生者，靡一不为。利必兴，害必除，百务必举，诸废俱修。自古藩司，未之前闻也”（《鄂尔泰年谱》，第9页）。故而雍正称赞他“自到江苏，声名甚好，毫不负朕恩，是天下第一布政”^②，他在任上所编选的《南邦黎献集》，恰是其整顿江南文教秩序的焦点所在。

《南邦黎献集》选录诗赋、古文诸体共647篇，分体编为十六卷。入选之人中，既有名士沈德潜、陈祖范，也有陈璋、宋照、杨绳武等乡居进士，亦有顾腾蛟、程世英、徐永宣等以诗名世者，还有许明伦等杰出士子，不一而足，可谓“甄拔之士，一时翹楚”^③。《南邦黎献集》共收赋36篇、颂11篇、诏6篇、诰5篇、箴6篇、铭7篇、序12篇、记19篇、论2篇、策3篇、传5篇、赞17篇、议5篇、文3篇、状4篇、书6篇、后3篇、笺3篇、考3篇、辩2篇、驳1篇、说3篇、跋2篇、碑3篇、拟七14篇、拟骚15篇、拟连珠155首、乐府69章、纪恩诗8首、纪事诗63首、纪行诗16首、咏怀诗42首、咏物诗26首、拟古诗35首、怀古诗37首。该书取《尚书》“万邦黎献，共惟帝臣”^④之意命名，以证明在雍正的统治下，“圣朝文教之隆，南国人才之盛，于斯极矣”^⑤。鄂尔泰又谓“今观于南邦，而万邦可知矣”（《南邦黎献集》“自序”），可见他将此集作为黼黻太平的典范。鄂尔泰于雍正元年升任江苏布政使后，即开始考课士子、着手选文，并于雍正三年（1725）刊行《南邦黎献集》。鄂尔泰通过对此选本的编纂，将文化、社会诸领域与政治权力的结构紧密地联系起来，对“江南”文教格局进行了构建。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清初幕府文人群体诗歌创作研究”（项目编号20BZW091）阶段性成果。

① 鄂容安等撰，李致忠点校《鄂尔泰年谱》附录《鄂文端公事略》，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34页。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册，第145页。

③ 法式善撰，涂雨公点校《陶庐杂录》卷三，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4页。

④ 孔安国传，孔颖达正义，黄怀信整理《尚书正义》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74页。

⑤ 鄂尔泰《奖励人材示文》，《南邦黎献集》，清雍正三年（1725）刊本。

一 以质抑文：厘正文体与整饬士风

《南邦黎献集》的编选寄寓了鄂尔泰厘正文体的指导思想。正文体是中国古代重建思想秩序的重要手段，正如张德建所指出的，厘正文体有着明确的目标和任务——崇正学、黜异端、正风格^①。但其基础是要求士子腹笥充实、关心时务、具有卓见，这就需要士子研读经史、博学于文。对鄂尔泰而言，厘正文体的措施一则倡导古学，引导士子识古通今；一则引领实学，将经世致用的主旨贯穿其中。

首先，鄂尔泰到江苏后，“以江南为才人渊藪，同观风所拔士子，时文优通，实学尚少。乃延访真才，试以时文之外，其于古学诸体各命一题，务完全卷”（《鄂尔泰年谱》，第12页）。显然，这一做法是鄂尔泰锐意革新士风、厘正文体的强烈信号，正如时人袁栋所记，“从前督抚藩臬观风，两艺外例有诗、赋二题，若不经意也。鄂时观风，四书三题外，诗、文、赋、颂、序、论、箴、铭共十余题”^②。清代自顺治开科以来，一再强调考试中要厘正文体，而制义之作旨在代圣贤立言，因此“厘正文体，首重八股”^③，这自然与科举考试只重首场有关。在此情形之下，极易形成士子钻研中选之文，模拟仿诵、束书不观的状况。雍正时沈进思上疏说“近来士子惟知习学时文，以为梯荣之具，身心民物，久置度外。”^④鄂尔泰敏锐地感觉到应当有针对性地对士子试以古文辞，引导他们“重朴学，戒空疏”^⑤。他在选编《南邦黎献集》时，即暗含古文与时文相通之意，将对文统与道统的坚持贯穿其中，实际上已经在实践“清真雅正”的正体原则。而“古文与时文的关联，实际上是文统向世俗功名的妥协”^⑥，亦即官方将文统纳入到治统麾下。《南邦黎献集》几乎对所有古文体裁都有所涉及，对科考二、三场之策问诸体尤为重视，其目的还是着眼于扭转浮薄的文风和士风，因为“经文或可欺门外汉，对策除平日多读书外，别无捷径也”^⑦。俞正燮曾撰《科举之学不坏人材论》，揭示出雍正朝特重二、三场，以防止考生拘泥于经义空论：“（雍正）十一年，上谕以二、三场策论尤足规经济实学，乃向来士子多不留心，而衡文者又每以经义已经入彀，遂将策论滥收恕取，不复加意阅看，殊非设科本意。”^⑧鄂尔泰在雍正初年即已察觉并开始纠偏，可见其远见卓识。

其次，《南邦黎献集》在文体的罗列和编次上，可说因材施教，而别裁之意寓焉。《南邦黎献集》共选诗文647篇，其中共收赋36篇，约占6%；其他诏、诰、记、论等196篇，约占30%；诗歌415篇，约占64%。其选文仿《文选》以“诗赋”为主，但选文的排序以赋为首，而将诗置于最末，这样的排序透露了鄂尔泰“以质抑文”的意图。虽然“诗赋欲丽”的论断广为人知，但由于萧统编《文

① 参见张德建《正文体与明代的思想秩序重建》，《文学遗产》2019年第1期。

② 袁栋《书隐丛说》卷七“南邦黎献集”条，《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137册，第495页。

③ 张希清、毛佩琦、李世愉主编，李世愉、胡平著《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清代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下册，第401页。

④ 沈曰富《沈端恪公年谱》卷下，《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90册，第282页。

⑤ 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故宫出版社2014年版，第269页。

⑥ 杨念群《清朝“文治”政策再研究》，《河北学刊》2019年第5期。

⑦ 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卷二七三《轺轩语二·语文第三》，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册，第9807页。

⑧ 俞正燮《癸巳存稿》卷一二《科举之学不坏人材论》，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77页。

选》“以文体之赋与六诗之赋联系起来，这就使得赋取得了《诗经》的直接继承身份”^①。如此一来，《南邦黎献集》以赋为首，自然也是秉承了崇儒重教的编选宗旨。鄂尔泰将诗置于最末，其中的价值判断不言自明。但从入选数量上来看，诗歌所占篇幅超过一半，显见鄂尔泰对于诗歌创作并非不重视，只是通过排序反映了他在观念和制度层面上对于诗歌的定位。他同样期望通过对诗歌典范的确立，形成一种导向，从而将诗歌创作也导入正轨。《南邦黎献集》中姜兆锡和伍起所作的《春风亭雅集记》，可谓借士子之口，道出了鄂尔泰借助此选本所收录之诗歌与江南文人在“诗学场域”竞争的意识。姜兆锡在《春风亭雅集记》中即将“西园雅集”与鄂尔泰“春风亭雅集”对立而言，指出“西园雅集”之“把酒赋诗”“捉麈挥毫”“弹奕（弈）品茶”皆是“讹雅”，而鄂尔泰之“讲论经史、点涂雅南”才是“正雅”^②。伍起也指出“文，末也；行，本也。”鄂尔泰之以诗课士，“非徒使之竞长角技于文艺之圃，抑将由文辞窥其性情心术，如子舆氏所为听言观眸子者，从而裁抑诱进之，俾克敛华就实也”^③，这可以看作鄂尔泰“以质抑文”理念的具体阐述。

最后，鄂尔泰在《南邦黎献集》中的评语也体现了他的古文观念。如果说遴选与排序是一种隐性的批评方式，那么评点则是他厘正文体的又一直接手段，正如清人魏世杰所云“古人文集不加批点，然有一经批点，则文之精神要领逼出纸上，或如颊上三毛，象外传神。”^④通过评点，编者可将自己的意志传递给他人。《南邦黎献集》中鄂尔泰的评语共一百九十八则，其评点重视用语、话题等具体着眼处，除命题外，既有立意、风格方面的规范，如其评语中多有“典重”“雅饬”“有典有则”“有体有要”“议论正大”等语；也有章法、结构方面的指导，对修辞技巧的阐述，甚或对一字一句的评判，如评施宾《日月合璧五星连珠赋》“气象昌明，词采醇正”，评盛元光《拟赐安南国王诏》“勉其导扬雅化，深得大体”等，都隐含着“导扬雅化”的前提。由以上论述可见，《南邦黎献集》的编选与评点已经进入到“清真雅正”这一正体原则确立的“过程”中^⑤。

另一方面，《南邦黎献集》的编纂也是鄂尔泰借以整饬“江南”士风的具体措施。清初帝王早已认识到士习、文风相为表里，因此“皆谆谆以士习、文风勤颁诰诫”^⑥，例如雍正正在《圣谕广训》中强调“士品果端，而后发为文章非空虚之论，见之施为非浮薄之行”^⑦。由此观之，厘正文体与整饬士风本是一体两面，所以《南邦黎献集》的编选在厘正文体之外，还借正士风来形塑社会风气。《南邦黎献集》“以质抑文”的指归，在整饬士风方面的意涵更加丰富。

首先，由文而趋质所关涉的层面可以上升到满族统治者与汉族知识精英的博弈。清初帝王时刻感受着来自“江南”的压力，这种压力更多是源于汉族知识精英的文化优越感，江南人文渊薮的地位“是江南文人拥有文明话语权的符号，也是自称‘文’气要远高于周边地区的一个空间象征”^⑧。作为少数民族统治者，雍正甫一即位，遇到的课题之一就是如何对这一财赋重地与人文渊薮进行治理，从而使以江南士人为代表的汉族文人能够真正从心理上臣服，这是清初康熙、雍正、乾隆三帝内心始终怀有的紧张心理。杨念群曾指出“清初帝王对‘江南’往往抱有既恐惧又不信任，既赞叹不已又满怀

① 傅刚《从〈文选〉选赋看萧统的赋文学观》，《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② 姜兆锡《春风亭雅集记》，《南邦黎献集》卷六，第26b叶。

③ 伍起《春风亭雅集记》，《南邦黎献集》卷六，第28a—28b叶。

④ 魏世杰《魏叔子文集外篇》“凡例”，魏禧著，胡守仁、姚品文、王能宪校点《魏叔子文集》，中华书局2003年版，上册，第30页。

⑤ 鄂尔泰评语参见《南邦黎献集》，不再一一出注，特此说明。

⑥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〇，中华书局1965年版，下册，第1729页。

⑦ 周振鹤撰集，顾美华点校《圣谕广训：集解与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61页。

⑧ 杨念群《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152页。

嫉妒的心态”^①，因为在清代统治者眼里最具汉人特征的事物均与“江南”密切相关。对雍正而言，“江南”文人所具有的文化自负与优越感，适可以用文化同一性的话语体系来消解。而他的手段便是争夺儒家的“教化”权，将“江南”士人所持有的文化权威收归己有，通过对文教政策的塑造，将大一统的设计渗透到文化层面。正如雍正二年（1724）他在鄂尔泰的奏折中所批示的“尔等地方大吏正己率属，徐徐化导，使百姓明识其非，乐从务本，知其利害，方可长久遵行，风移俗化也。……就风俗而理之，从容布置，委曲开导，方可有成。”^②在雍正的设计中，化民成俗是其文教政策的最终目标，是要将汉族精英文化规范到清代思想文化“大一统”的轨道上来。

其次，对崇俭抑奢、由文返质的提倡，是削弱江南文化权威的一种策略。雍正对于江南文词甲于天下而风俗浇离弊坏的状况深恶痛绝，认为必须加以整饬。在他看来，“士子者，百姓所观瞻，士习不端，民风何由得厚？是以考课士子，设立举优黜劣之典，以为移风易俗之道，所关亦綦重矣”^③。帝王所定的基调很快得到了地方官员的积极响应，鄂尔泰在奏折中指出“江苏地方，外似繁华，中实凋敝。加以风俗奢靡，人情浮薄，纵遇丰年，亦难为继。”（《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3册，第145页）这样的舆论自然是对社会实际情况的概括，但也不乏政治心术，即以“质”抗“文”。雍正即认为应当对满族“质”的一面保持自信，他指出满人“即使果能力学，亦岂能及江南汉人，何必舍己之长技，而强习所不能耶”，“惟我满洲本习，纯一笃实、忠孝廉节之行，所宜敦勉”（《〈清实录〉科举史料汇编》，第154页）。而对于江南世俗生活的奢靡风气，清初帝王皆充满警惕、严加防范，认为平衡“文”“质”是很有必要的。从这个意义来看，《南邦黎献集》的价值导向也就更加凸显了。如前所论，鄂尔泰编选此集，首要关注的是对“江南”文士的收编，是对帝国最难治理地域的化导，他在《南邦黎献集序》中透露“南邦者，南方文献之邦也。昔者子游返吴，夫子有‘吾道南矣’之叹，而南邦之文学至今罕匹俦焉。盖言氏之教入人者深，其来有自矣。但其地以元明积习相仍，赋税繁重，又加以频年荒歉，日就凋敝。士亦谋生不给，其稍有才华者，多糊口四方。而其屈首庸下者，非迫于饥寒，即苦于追呼，士气渐以不振。”（《南邦黎献集》“自序”）由这段议论可以看出，鄂尔泰所理解的“南邦”是“南方文献之邦”，试图以文化意义将整个“江南”涵括进来。他承认“江南”文化曾经的辉煌，但又明确指出，元明以来此地经济“日就凋敝”，“士亦谋生不给”，“士气渐以不振”。显然，这样的描述不尽符合实际，但其目的是通过官方选本给江南士子以强烈的心理暗示，指出江南士林之衰敝乃是由于晚明以来过分追求“文”的一面。唯有如此，才能凸显清朝君主的贤明，证明清朝统治者“质”的本色恰是救世之良药，进而将泽化南邦的“教化”权威赋予清朝天子。而雍正皇帝开恩科、广士额，追封孔子先祖，增祀历代名儒等行为，正是掌握了文化正统的体现。

二 崇儒重道：攫取江南教化权威

雍正皇帝在其执政后期曾评价鄂尔泰“实能体朕之心，教养百姓，而民风淳厚，又能服教乐善，以此感召天和”^④，足见鄂尔泰的行政作为实能契合雍正的心意，尤其是在“教化”方面，得到了帝王的称许。实际上，雍正与鄂尔泰在面对“江南”时，都迫切想要树立权威，试图消解来自于汉族知识精英的文化压力，将教化权牢牢掌握在手中，进而证明自身统治的合法性。有学者指出，清初帝王合

① 《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第13页。

② 俞冰、杨光辉编《原钞本朱批鄂太保奏折》，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5年版，第1册，第16—17页。

③ 王炜编校《〈清实录〉科举史料汇编》，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9页。

④ 雍正《大义觉迷录》，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资料》第四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2页。

“治统”与“道统”为一，彻底打破了士人与帝王“共治天下”的政治传统，使士人沦为皇权的附庸^①。《南邦黎献集》的编纂即反映了这一角力过程。鄂尔泰在编纂此集时旗帜鲜明地强调崇儒重道，以“道统”的占有者自居，又反过来约束和引导汉族知识精英，颇有些“以彼之矛，攻彼之盾”的意味。考虑到他是以“课士”为手段来完成对江南士人的“教化”的，那么这一过程可被视作“政治场域”对“教育场域”的规范。从鄂尔泰在江南的实践来看，他借助对《南邦黎献集》的编纂，巧妙地通过对儒家礼仪的规范和对书院风气的引导，将政治势力渗透到文化领域。而“政治场域”与“教育场域”交锋的“次级场域”，一为孔庙，一为苏州紫阳书院。

鄂尔泰到达苏州的次日，恰逢丁祭^②，他便效法雍正赴孔庙恭谒释奠。但他随即发现作为儒家士子精神堡垒的孔庙，不但环境秽乱不堪“蛛尘百斛，庙貌埋埃垢之中；黼黻千箕，腥秽闻宫墙之外”^③，而且祭仪不合礼制，杂乱无章，流于形式。凡此种种，不仅显示出地方官员塞责敷衍，也反映出士子对祭孔仪式的严肃性与神圣性的无视。鄂尔泰敏锐地感觉到，除整顿吏治外，还可借“肃丁祭”来化导士子，进而占领这块思想阵地。毫无疑问，孔庙及祭孔仪式恰是儒家道统在制度层面的体现，是“传统社会里政治与文化两股力量最耀眼的交点”^④。如能将这一“场域”纳入皇权的掌控之中，对于巩固清王朝的统治是大有裨益的。对此，雍正早有洞察：

使非孔子立教垂训，则上下何以辨？礼制何以达？此孔子所以治万世之天下，而为生民以来所未有也。使为君者不知尊崇孔子，亦何以建极于上而表正万邦乎？人第知孔子之教在明伦纪、辨名分、正人心、端风俗，亦知伦纪既明，名分既辨，人心既正，风俗既端，而受其益者之尤在君上也哉？朕故表而出之，以见孔子之道之大，而孔子之功之隆也。（庞钟璐《文庙祀典考》卷一，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8年版，第12b叶）

作为一个务实的帝王，雍正在此上谕中对于帝王心机毫不掩饰，其推尊孔子的目的就是维护其统治。观雍正一朝，他对孔子的推尊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宣称自幼即对孔子“心切景仰”，即位后即令追封孔子五世为王爵（参见《文庙祀典考》卷一，第8a叶）。雍正二年，孔庙复祀林放等六人，增祀黄幹等二十人，是唐代以后孔庙最大规模的增祀（参见《文庙祀典考》卷一，第9b叶）。雍正四年（1726）八月，雍正更是做出惊人之举。他在赴孔庙释奠时跪献孔子，并发布上谕曰“仪注内开、奠帛、献爵，皆不跪。朕今跪献，非误也。若立献于先师之前，朕心有所不安。将此谕众知之，尔衙门可记载，嗣后照此遵行。”^⑤无怪乎乾隆评价乃父“圣学高深，探性命之精，操治平之要，天德王道一以贯之。隆礼先师孔子，增祀先儒，右文重道之典，超越常制”^⑥。清朝统治者都明白，牢守儒家正统，是合理化其统治的最大资本。因此，雍正表率于前，臣子们响应于后。《南邦黎献集》即是鄂尔泰手中的舆论阵地，卷八就收录了多篇鄂尔泰所作之文，申明孔庙祭祀相关事宜之规范。例如《丁祭示有司及学官文》，他为整饬祭孔仪式，严厉申斥了地方官员尸位素餐的行为；针对祭仪不合礼制之处，申之以条约八项，从祭品等级、数额，与祭官员规范，乐舞仪程，日常管理等方面做出严格规定。《圣庙五王昭穆位次议》《圣庙历代明贤崇祀议》《祭圣庙五王文》诸文，皆针对规范与继承儒家道统而发。鄂尔泰的这些举措，反映了雍正君臣的共识，即“‘治统’的承接必得倚‘道统’之传，不仅

① 参见黄进兴《优入圣域：权力、信仰与正当性》，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4页《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第98页。

② 丁祭，旧时于每年阴历二月、八月第一个丁日祭祀孔子。隋朝一年有四祭，唐开元后专用春、秋二祭。

③ 鄂尔泰《丁祭示有司及学官文》，《南邦黎献集》卷八，第20a叶。

④ 黄进兴《圣贤与圣徒》，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7页。

⑤ 《钦定皇朝通典》卷四八《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642册，第644页。

⑥ 爱新觉罗·弘历《乾隆御制诗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册，第386页。

在意理上,同时在祭祀制度上确立”(《优入圣域:权力、信仰与正当性》,第120页),而为了最大程度地显示自己对儒家礼仪正统性的继承,除了广泛刊布外,鄂尔泰还将这些教令收入《南邦黎献集》,立为典范,让士子传览学习,将官方意志传导到每一个读书人。可见他已认识到“坚持正确地实施与这些礼仪有关的制度是确保地方精英同朝廷行动一致的一种手段”^①,而他俨然成为儒家思想在“江南”的主导者和代言人。

在对“教育场域”的规范和改造中,鄂尔泰同样重视对于书院这一“次级场域”的渗透,努力将其纳入到官方教育体系之中,使其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集散地。虽然自元明以来,书院的官学化特征越来越明显,但书院讲授“私学”的传统始终未曾断绝,甚至在晚明时期还出现了“以讲学之故,致干时君、时相之怒”^②的情形。书院裁量人物、干预政事的风气颇为清朝统治者所忌惮,因而如何去消解书院对官方专制力量的冲击,也是清代统治者所面临的挑战之一。雍正即位之初即对书院的作用充满狐疑,他认为“欲使士习端方,文风振起,必赖大臣督率所司,躬行实践,倡导于先”(《清实录》科举史料汇编,第163页),而“书院之设,实有裨益者少,浮慕虚名者多”,可见其基本态度还是依靠官方教育体系来教化臣民。直到雍正十一年(1733),他通令全国直省省城设立书院,并各赐帑金千两。对于政策的转变,雍正解释道“近见各省大吏,渐知崇尚实政,不事沽名邀誉之为,而读书应举者,亦颇能屏去浮嚣奔竞之习。则建立书院,择一省文行兼优之士读书其中,使之朝夕讲诵,整躬励行,有所成就,俾远近士子观感奋发,亦兴贤育才之一道也。”^③这一转变实际上是因为他看到了地方大吏对自己所作指导的响应,鄂尔泰、李卫、陈宏谋等官员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罗威廉所指出的,他们在基层教育中“特别关心并积极参与管理的是儒家精英汇集并主导的书院,以及自由空间较大的地方基层义学”^④。由于书院的所有权有点模糊,鄂尔泰等人对于地方影响较大的书院以官方赞助的形式加以控制,规定馆师和生徒的人选、考课的题目、膏火的数量等皆由官方决定,积极促使“书院成为变相的官办学校”^⑤。这些举措还是基于“教化风俗之原,人才为政事之本,而学校者,人才所从出,风俗所视以移易者也”^⑥的基本共识。鄂尔泰在苏藩任上整葺苏州紫阳书院,训示士子敦行崇实,于诸生厚加膏火,躬身会课于紫阳书院之春风亭,目的就是使书院教学目标同国家教育目标相一致。除官方赞助外,鄂尔泰对于紫阳书院的运行还给予具体的指导:他聘请朱熹后人朱启昆为山长,对于书院的教学计划也亲自掌控,定期亲自去讲课并命题课士。通过这些途径,鄂尔泰对书院施加了具体的影响,使书院的教学导向与自己的预期相一致。为了营造声势,以群体的力量扩大其在“教育场域”的影响力,鄂尔泰从课士之文中遴选符合其主张者并编选为《南邦黎献集》的行为,也是别具意义的活动。对鄂尔泰而言,此选本的编纂绝非沽名钓誉、附庸风雅,其根本目的是以教化者的身份主导风气,以编纂选本作为手段,向为学者灌输官方意识形态及其价值观,将“南邦人士其得沐浴于圣天子教育之中”(《南邦黎献集》“自序”)的指归广为宣扬。鄂尔泰身兼官员与老师两重身份,其所编选的作品便具有了为政权所承认的象征意义。因而《南邦黎献集》既是学官传授的标准,也是后学模拟的典范。鄂尔泰正是借由改造书院、编纂选本的方式,实现了对“教育场域”的整顿与引导,将自己崇尚实学的理念渗透到书院的日常教学之中。

① 罗威廉著,陈乃宣、李兴华、胡玲等译,赵刚、孔祥文审校《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23页。

② 熊赐履《经义斋集》卷五《重修东林书院记》,《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39册,第102页。

③ 《清朝文献通考》卷七〇,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册,第5504页。

④ 《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第588页。

⑤ 刘玉才《清代书院与学术变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1页。

⑥ 陈宏谋《培远堂文集》卷九《雍正己酉科山西乡试策问五道》,《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81册,第633页。

三 歌扬圣泽：塑造盛世与政教合流

每个政权在其建立之初都必须解决的问题，就是拥有统治的合法性，即占据“正统”地位。清初帝王在这一问题上的具体表现，是对追求“三代之治”的反复强调。这一方面是由于清代统治者以“三代”为治理楷范，可直接将自身统治上溯到士人认可的制度传统；另一方面则是清代统治者因自己满人的身份，更须强调自身统治的优越性超越前代，甚至可与“三代”圣王相媲美。康熙、雍正曾多次提出“复三代”的构想，即是构建统治合法性之文化根基的举措之一。因此，清初诸帝都致力于打造“圣君”形象，塑造“盛世”景象，正是为了证明清朝入主中原的合法性。其实，清初帝王“复三代”的理念，还隐含着他们促成“道统”与“治统”合一的愿望。因为“三代”是“治教合一”，因此将“三代”与当代相提并论，恰好与清代统治者所期望的政教合流，剥夺士人以“道”抗“势”之权利的目标相一致。细考这一过程，帝王倡导于上，臣工鼓扬于下，鄂尔泰等人便是积极的实践者。

《南邦黎献集》中“三代”“尧舜”“盛世”“圣哲”等词连篇累牍地出现，实不能简单地以“颂圣”视之，其在观念层面对士风的影响尤其值得重视。鄂尔泰等人在《南邦黎献集》中塑造了雍正崇文教、重民生、致祥瑞的“圣君”形象，甚至直呼雍正为尧舜复生，其论调显然是对帝王“复三代”理想的积极呼应。

首先，鄂尔泰以“祥瑞”来验明雍正是天命之主、帝舜之后身。雍正三年二月初二，发生了日月同升和五星连珠的天文现象。这种现象数百年才会出现一次，历来被视为嘉瑞，雍正帝也认为这是幸事。鄂尔泰迅速响应，以此为题课士，为雍正广造声势。《南邦黎献集》卷一收入鄂尔泰、姚培衷、盛元光、倪承茂、周日藻、许其恕、孙宏纶、张进、施宾、蔡书升等十人所作的《日月合璧五星连珠赋》，胡鸣玉、倪承茂、曹基、翁冯渊等四人所作的《重华协于帝赋》，接近所收赋作的半数，其典范意义不言而喻。鄂尔泰《日月合璧五星连珠赋序》云：

合璧连珠，同聚一方，虽知其为非常之应，而三皇既邈，后世无闻。惟《宋书》有之，曰帝尧在位七十载，景星出翼，日月若合璧，五星如连珠，乃归功于舜。由此观之，岂非以二帝相继，光华所萃，若合若连，与天同符之明验哉？……我皇上以圣继圣，正如舜之绍尧，此重华复旦，再见今兹矣。……圣祖仁皇帝神圣文武，广运无方，成功文章，巍焕已极，是千古以来又一尧也。我皇上明目达聪，庶绩咸凝，光天之下，及于海隅，是千古以来又一舜也。是以太和之气上应天心而征乎天象，岂偶然者哉！（《南邦黎献集》卷一，第2a—2b叶）

祥瑞之兆历来被视作君主有德、政治清明的象征，所谓“治隆而道明”^①。鄂尔泰以此难逢之嘉瑞，将康熙、雍正当比于尧、舜，可谓深得雍正之心。而直指“三代”的叙述策略，也在无形中成为创作的导向。鄂尔泰更借江南士子之口来形成舆论，如蔡书升“圣人御极，溯景运于尧天；帝德乘乾，焕苞符于舜日”^②，胡鸣玉“圣以继圣，群工瞻颺若于躬行”^③等言，皆将雍正比为“三代圣王”，足见雍正君臣塑造基层士人思想的轨迹。

其次，盛赞雍正深恤黎民之圣德，以为万世明君。雍正三年五月，下诏蠲免苏州、松江二府浮粮，其中苏州府三十万两，松江府十五万两。江南之有浮粮始于明朝，此积弊延续至清代，“有粮无田，每岁不能完纳，致百姓卖妻鬻子，而追呼不息，所在逃亡。此数百年相沿之累，苏，松为尤甚”（《鄂尔泰年谱》，第16页）。至此，苏、松二府第一大疾苦被解决。鄂尔泰又抓住这一契机，大事宣扬。《南

① 陈祖范《复先贤言子宅记》，《南邦黎献集》卷六，第10a叶。

② 蔡书升《日月合璧五星连珠赋》，《南邦黎献集》卷一，第25a叶。

③ 胡鸣玉《重华协于帝赋》，《南邦黎献集》卷一，第29b叶。

《南邦黎献集》卷三收录叶长扬、宋照所作《蠲免苏松两郡浮粮颂》，沈德潜、顾我錡、倪承茂所作《圣主得贤臣颂》，卷一四收录鄂尔泰、陈璋、杨绳武、夏慎枢所作《纪恩诗》，皆是应鄂尔泰命题而作。在其引导下，这些诗文极言明朝对“江南”的严酷盘剥，如姚培表云“洪武以官田之租摊为民田之税，而赋乃重。……此苏、松二府之浮粮为历久之苛政，而未能豁除一旦者也”^①，叶长扬云“惟兹浮粮，昉于前代，地非加广，赋几逾倍，有明相沿，越三百载，民力几何，未免称贷”^②。他们反复渲染前明之苛政，是为了给清帝比肩唐虞正名，强化雍正“仁君”“圣哲”的形象。诸如夏慎枢“巍巍我皇圣天子，超迈前代轶后王”^③的诗句，鄂尔泰对周日藻和姚培表所作之颂“似三代颂词”“亦《豳》亦《雅》，似鲁似周，犹聆三代遗音”的评语，皆可作如是观。

此外，鄂尔泰还通过《南邦黎献集》积极呼应雍正“神道设教”的统治策略，论证其统治的合法性。在清朝诸帝中，雍正善用一种特殊的统治手段，即崇尚天人感应，借瑞兆以树立自己圣明帝王的形象。雍正一朝，祥瑞层出不穷，雍正帝曾自豪地宣称本朝祥瑞“自古史册所艳称而罕覩者，莫不备臻而毕具”^④。对于臣子奏报祥瑞，雍正也是屡加鼓励，郑重宣付史馆。其臣工之中，田文镜、鄂尔泰最擅此术。鄂尔泰后来任云贵总督时，多次奏报云贵出现卿云、醴泉、嘉禾、瑞鹤等休征。但他所报之祥瑞，并非简单地以报祲祥取悦皇帝，而“大多系根据雍正统治需要编造”^⑤。如雍正六年（1728）十二月鄂尔泰奏报，万寿节当日，云南四府三县出现五色卿云，光灿捧日。“卿云”的出现被视为天子纯孝的表现，鄂尔泰特意在奏折中说那是“皇上大孝格天”（《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4册，第150页）所致。当时曾静投书案发生不久，曾静指责雍正为谋父、逼母、弑兄的无道之君，民间舆论哗然。鄂尔泰此时奏报“卿云”之祥瑞，实是出于政治动机。雍正为表感激，将云南官员加官进爵，鄂尔泰由头等轻车都尉超授三等男爵，可见雍正和鄂尔泰在运用“祥瑞”手段巩固统治方面的默契。正如冯尔康先生所言“将献祥瑞宣示廷臣，宣付史馆，这是制造舆论，所以祥瑞、舆论、政治三位一体。”^⑥鄂尔泰通过《南邦黎献集》积极贯彻帝王自我神圣化的意图，反映了地方官员对于构建雍正“圣王”形象的自觉性。而他借助“祥瑞”来制造舆论的手段，正是雍正以“神道设教”巩固其统治的思想在基层的具体实践。在他的引导下，士子们也逐渐成为了帝王意志的传扬者，如周日藻表明自己作赋的动机为“道扬盛世，以垂方来，亦古所称报国恩惟在文章之意云”^⑦，陆瀛龄认为“夫歌颂太平，导扬休美，可以信乎今而传乎后者，亦儒生事也”^⑧，这些都证明了士子对鼓扬盛世的文学侍从角色的自觉接受。杨念群认为“清康、雍、乾三帝刻意打造‘圣君’形象，衔接‘治统’与‘道统’的政治理念，无形中使二者会聚于‘皇权’制约之下，清帝不仅是‘治统’的拥有者，亦变成了‘道统’的守护神”（《清朝“文治”政策再研究》）。黄进兴也指出清初帝王努力使政治势力延伸到文化领域，主动介入思想与文化的传统，使“‘皇权’变成‘政治’与‘文化’运作的核心，而统治者遂成为两项传统最终的权威”（《优入圣域：权力、信仰与正当性》，第124页）。士林舆论与官方意识的合流，在《南邦黎献集》中亦可见一斑。

① 姚培表《蠲免苏松两郡浮粮颂》，《南邦黎献集》卷三，第6a叶。

② 叶长扬《蠲免苏松两郡浮粮颂》，《南邦黎献集》卷三，第2b叶。

③ 夏慎枢《皇恩蠲免浮粮恭纪四十韵》，《南邦黎献集》卷一四，第8a叶。

④ 《大义觉迷录》，《清史资料》第四辑，第24页。

⑤ 高翔《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41页。

⑥ 冯尔康著，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编《雍正帝及其时代》，天津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53页。

⑦ 周日藻《日月合璧五星连珠赋》，《南邦黎献集》卷一，第14a叶。

⑧ 陆瀛龄《日月合璧五星连珠记》，《南邦黎献集》卷六，第2b叶。

四 宣化南邦：鄂尔泰对江南文教格局的影响

鄂尔泰精明强干，雍正视其为股肱之臣。二人的君臣遇合，很大程度上来源于鄂尔泰对雍正统治理念的敏锐领会与积极实践。鄂尔泰在苏藩任上励精图治，使《南邦黎献集》这一选本在政治、教育等领域发挥了重要的统合作用，将官方意识形态、特定的文学观念灌输给江南士子，以改造社会风气，进而在社会结构的重构方面产生作用。其着眼点即在于“这些教育行动符合在权力关系中处于不同地位的集团或阶级的物质和符号利益，它们总是有助于这些集团或阶级之间文化资本分配结构的再生产，从而也有助于社会结构的再生产”^①，其终极目标始终是维护统治者的利益。对于清代统治者而言，文化教育的目的是使社会有序，使社会结构和统治秩序稳定，而不是舞文弄墨、炫耀学问。

关于《南邦黎献集》对江南文教格局的影响，还有如下几个问题值得关注：

第一，鄂尔泰通过对紫阳书院与士子考课的影响，揭批宋明理学积弊，论经史、谈经济，对于三吴学术风气的转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柳诒徵《江苏书院志初稿》曾指出“紫阳创于张伯行。而盛于鄂尔泰。雍正初年，鄂尔泰为苏藩。访求才彦。召集省会。为春风亭会课。躬宴之于署斋。已复留若干人肄业于书院。鄂尔泰与苏之绅耆，及一时召集之士所作之文，若诗，汇刻为《南邦耆献集》。书院之由讲求心性，变为稽古考文。殆以是为津渡。此康熙以降书院之美谈也。”^②在《（同治）苏州府志》所列紫阳书院掌院名单中，题名《南邦黎献集》者即有朱启昆、陈祖范、沈德潜等人，随后书院又培养出了王鸣盛、王昶、钱大昕等汉学家，皆是转移学风的关键人物。其实，雍正二年孔庙复祀郑玄、范宁，即有重立“汉帜”之意，这一举措实已为考证学风预留伏笔。鄂尔泰在江南敏锐地体察到帝王的意志，并付诸实践，终成一代学风转变之关捩。

第二，《南邦黎献集》既反映出清代统治阶级对江南文化的攀附与容受，又体现了鄂尔泰对江南士人创作风气的引导。不可否认，鄂尔泰对于江南的“文气”是充满歆羡的，但其在面对汉族士人最擅长的文学传统时又是充满警惕的，避免被汉族知识精英的文化传统所同化，正如雍正所指出的“我满洲人等笃于事上，一意竭诚孝于父母，不好货财，虽极贫困窘迫，不行无耻卑鄙之事，此我满洲人之所长也。读书者，亦欲知此而行之耳，徒读书而不能行，转不如不读书而能行也。本朝龙兴，混一区宇，惟恃实行与武略耳，并未尝恃虚文以粉饰，而凡厥政务，悉吻合于古来圣帝明王之微猷，并无稍有不及之处，观此可知实行之胜于虚文矣。我满洲人等纯一笃实、忠孝廉节之行，岂不胜于汉人之文艺、蒙古之经典欤？”（《清实录》科举史料汇编，第154页）故而《南邦黎献集》一方面承认、因袭“江南”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又在强调、引导这一传统中为统治者所认可并对其有用的部分。《南邦黎献集》中涉及江南地域文化的作品，多以颂扬乡贤、考订史迹为题，如《先贤言子传》《季札传》《阖闾门考》《分金墩辨》《吴中八表赞》《吴中六绝赞》等，而对于苏州地方最具文学意味的文化名胜——虎丘、沧浪亭等却避而不谈。其隐含的导向即是淡化诗意的抒情而追求端正、谨严的风格，鄂尔泰聚士子于其春风亭、慎时哉轩，别树一帜之意显矣。

第三，《南邦黎献集》选诗所确立的标准，反映了清代中期诗歌典雅化、缙绅化的变化趋向。前已论及，鄂尔泰将诗歌置于选本最末，反映了他在观念和制度层面对诗歌的定位。但其选诗数量众多，加之此选本的示范意义，使其在诗歌体裁、题材与立意方面皆对士子施加影响。科举自宋代以来，即以经义取士，而不试诗赋，但古学的复兴使清儒认识到，“诗歌，尤其是律诗，对借助文字音韵训诂之

① 布尔迪约、帕斯隆著，邢克超译《再生产：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9页。

② 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册，第56页。

学恢复古学面貌所具有的重要价值”^①。清代统治者亦关注到诗歌在整饬士人精神方面所产生的影响，因而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诏试五言八韵诗，此后科考第二场以五言八韵诗取代诏、诰、表、判。统治者认为“诗是一种忠于中央政府的象征行为。因此并仅因此，诗歌的撰写被用作进士考试中对未来官员的一种考核手段”，这种手段可用来验证士子“能够转化危险的个人趣味并因此具备服务国家的条件”^②。鄂尔泰在“江南”的实践正是以此为出发点展开的。此外，鄂尔泰在此选本中确立的“斋庄中正”“倡明教化”^③的诗教标准，后清中期“格调说”之先声。尤其是《南邦黎献集》作为当时有重要影响的选本，为沈德潜受知于乾隆提供了媒介。袁枚《随园诗话》曾记载这一文坛掌故“西林鄂公为江苏布政使，刻《南邦黎献集》；沈归愚尚书时为秀才，得与其选。后此本进呈御览，沈之受知，从此始也。”^④沈德潜受鄂尔泰赏识、教导，才得以被乾隆识拔，此事深刻地影响了清中期诗坛的走向。可以说，《南邦黎献集》是其日后显达的关键一环。

第四，鄂尔泰赴任江南后，具有与南邦文士“争胜”的自觉意识，这一意识反映了满、汉文士在“文学场域”的交锋。虽然雍正及鄂尔泰极力想要通过“以质抑文”的策略来占据文化方面的主导权，但他们都清楚，这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做到的。鄂尔泰曾在奏折中透露出这一隐忧“国家一统垂八十余年，圣圣相承，教养备至，而汉人之心思终不能一视，满洲之人物犹未能争光。每一念及，臣窃有余恨。”^⑤因此鄂尔泰在江苏重视文教，躬身创作，其在《南邦黎献集》中收入自己的作品71篇（其中诗64首，赋1篇，文3篇，议2篇，序1篇），居于各类之首，其标杆意义亦不容忽视，同时这也是其“争胜”心态的体现。他迫切期望满族士人能够在文坛占据一席之地，改变世人对满人“质鲁”的印象。杨钟羲《雪桥诗话》中的相关记载颇耐人寻味“鄂西林开藩吴下，尝以暮春集多士于春风亭，为言‘自之官未宴一客，今具含桃竹芽，与诸君共赏清味，殆不忘做秀才咬菜故态也，且世俗几以‘书生’二字作谥人语。然二字意味，外人如何得知？今又何须脱却耶’！丹阳姜夷斋兆锡作诗四章纪之。阿文成公谓‘公于吴禁奢汰，遏佚游，甚至厥口诅祝。不得已，以诗自鸣。论者又或以迂远目之。’公尝有句云‘敢以迂疏闲略事，不将廉介巧谋身。’当时必有书生短公者。”^⑥鄂尔泰性格方严、不苟言笑，在江苏崇俭抑奢、整顿风俗，固然不为流俗所喜，但文中“不得已，以诗自鸣”“当时必有书生短公者”之句，可谓切中要害，反映出鄂尔泰极力为满人争胜却力不从心的尴尬境地。

综上所述，鄂尔泰通过对《南邦黎献集》编纂过程的全面介入，既能发挥儒家在道德教化方面的作用，“面向社会上层，让政治精英与文化精英自我完善，追求道统”^⑦；又可介入其他领域，引领学风、塑造士风、改造民风，以构建符合统治者利益的社会结构。《南邦黎献集》正是立体透视雍正朝“江南”文教秩序构建“过程”的标本，其影响与价值值得学界进一步探讨。

【作者简介】侯冬，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发表过论文《曾燠幕府雅集与乾嘉之际文人心态》等。

（责任编辑 马 昕）

① 本杰明·艾尔曼著，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译《经学·科举·文化史：艾尔曼自选集》，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9页。

② 宇文所安著，陈小亮译《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世界的征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2—13页。

③ 江兆锡《春风亭雅集记》，《南邦黎献集》卷六，第26b—27a叶。

④ 袁枚著，王英志校点《随园诗话》卷五，凤凰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页。

⑤ 转引自宫崎市定著，孙晓莹译《雍正帝——中国的独裁君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35页。

⑥ 杨钟羲著，雷恩海、姜朝晖校点《雪桥诗话全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册，第971页。

⑦ 吴雅迪《鄂尔泰〈丁祭教〉与清初儒学在西南地区的传播》，《孔子学刊》第5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